

司号员就位

■本报记者 汪娜 特约通讯员 林梓栋 武岑

6月10日5时50分,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,嘹亮的起床号音响彻整个校园。第二期司号员学员迅速列队后向操场奔去,军号别在腰间,号嘴揣在上衣兜里。三公里晨跑结束,队伍集合在学院西北角的白楼前,学员们开始了一天的司号训练。左手叉腰、右手持号,头一仰,一串号音刺破晨雾,号管上的红绸在微风中起舞。

一切从零开始

2018年9月,军委训练管理部发布消息,我军司号制度恢复和完善工作全面展开,拟从2018年10月1日起全面恢复播放作息号;2019年8月1日起,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。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承接了开设司号员培训班的任务。

在我军通信兵序列中,司号员是个特殊的兵种。从1927年建军开始,军号就与人民军队联系在一起,在作战和战备训练、工作、生活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随着战争形态的演进和我军现代化发展,军号的指挥通信功能逐步弱化,司号员编制在“百万大裁军”中被整编撤销。

30多年的历史断档,让接受培训任务的军事文艺创演系犯了难。两个月时间能培养出合格的司号员吗?这一度成为创演系主任徐惠冬想得最多的问题:“没有参照可循,没有专职老师,一切都要从零开始。”

受领任务后,创演系立即成立专门课题组进行研究,到基层部队、军队院校和军乐团等单位进行调研,综合意见建议后,对教学大纲和训练教材进行初步拟定。大家都一个共识,这是一场要打赢、也必须打赢的战斗。

3月初,首期司号员正式开课,而大纲和教案也是边教边改。“课题组每周召开教研会,左刚、万千里、刘保国、王强等四位吹奏课教员根据教学实践对大纲和教材提出修改意见。”据徐惠冬主任介绍,正式的教学大纲和训练教案将在7月底付梓。

在此之前,一切都在摸索中。其中就包括对军号嘴的设计改动。

“培训使用的军号由军委训管部下发,是1985年封存起来的一批军号。训练中,教员普遍反映老式号嘴偏浅偏小,对号嘴进行合理改良能降低学员的学习难度。”创演系教研室主任梁召今介绍,在结合教员提议和学员意见后,学院立即联系地方厂家对号嘴进行改良。很快,一批新的号嘴配发到学员手中。

改变的不仅是号嘴,还有教室。

第一期培训班开班之初,学员在临近街边的一栋红楼里进行吹奏练习。此起彼伏的练习声在遭到“投诉”后,学员“不敢吹了”,吹奏积极性打消不少。了解情况后,创演系立即为司号班调整出十几间专门的隔音教室。有了专属教室,学员们的思想包袱没了,号音也活跃了起来。

第一期培训班结业时,教研室召集教员和学员代表开了一次通气会。会上,大家畅所欲言。“主要是提问题,集思广益。”徐惠冬介绍。会后,学院根据学员提出的问题,对课程计划进行调整。“第二期培训方案将音乐基础、司号史、思想政治等课程时间前移,在

第一个月全部结束,为后期吹奏练习预留足够时间。”

勇敢的“跨界行动”

坐在南京开往北京的高铁上,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部中士沈婉仪内心忐忑不安。“不懂音乐,从没接触过军号,要在两个月时间里熟练吹奏21个号谱,可能吗?”带着疑问,沈婉仪开始了在北京的训练生活。

新年刚过,沈婉仪和来自全军的40名士官被选拔为全军首批司号学员。他们有的是通信兵、驾驶员,还有的是导弹发射手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这将是一次勇敢的“跨界行动”。

“对学员的吹奏水平摸底后,我发现,虽说大家的水平参差不齐,有音乐基础的学员也不多,但都是各单位按政治素质、军事素质、文化素质、身体条件选出来的尖子,领悟能力强、学习能力强,这给我们打了一剂强心针。”梁召今对学员充满信心。

“节奏感、音准感较好;肺活量好,嘴唇相对薄、无外伤,牙齿整齐,口腔无手术……”这是各单位选送司号学员的基本条件。采访中,海军航空大学某部上士张国强指着自己的嘴唇对记者说:“你看,我的嘴唇是班里最厚的。”一句话,引得大家笑了起来。“但努力可以弥补短板。别人练一遍,我就练10遍,勤奋使我变得强大。”

陆军某部四级军士长韩军杰擅长长笛演奏,“本以为长笛吹得好,小号学起来会很快。而这些都是我自己的‘以为’。”练习吹奏的第一天,韩军杰在嘴唇上“卡了壳”。

正确的吹奏嘴形是吹好军号的第一步,但稳固正确嘴形并非易事。

采访中,武警某部下士杨鹏一直在叠纸片,只见他将一张完整的A4纸裁成6厘米长、4厘米宽的小纸条,再将纸条折成2厘米长、0.5厘米宽、0.2厘米厚的纸片——这是吹奏练习的重要道具。将纸片放在唇间,用唇尖力量夹住纸片保持20-30分钟(俗称“叼纸片”)是快速固定嘴形、锻炼唇尖肌肉控制力的一个好办法。

“30分钟叼纸片练习后,嘴巴又酸又麻。有时吃饭时嘴还是抖的。”火箭军某部下士樊斐笑着说。除了纸片,学员还被要求随身携带一面小镜子,随时查看嘴形是否正确。“吹奏结束,如果嘴唇正中留下了一圈红色印记,那就说明嘴形对了。”

刚接触军号时,学员们只有憋足了劲,才能吹响那么一两声。几天后,虽不那么吃力,但因为气短音高顶不上去,吹出来也难成调。

焦虑如乌云罩顶,在重复“哆、咪、嗦”的过程中,学员们的嘴肿了消、消了肿,反反复复,人也晒黑了一圈,但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,让“不可能”成为“可能”。这一点,武警某部下士侯猛飞感受最深。

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打在他的脸上,油光细密。侯猛飞喜欢站在白楼前的大杨树下吹号,“室外无混响,我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声音,及时发现并改正错误。就是一点不好,天气热,嘴唇火辣辣地疼。”干裂、皴皮,侯猛飞不停地抹着润唇膏,两个月用了5管。

沈婉仪是班里唯一的女生,但司号员不分男女,来自男兵的压力激励着她不断向前!向前!“自己动手写练习曲辅助吹奏练习,这点很棒。”沈婉仪的努力得到了班主任杨磊的赞许。结业考试中,她拿到了乐理科第二名的好成绩。“号音吹得比男兵更高、更亮。这就叫优秀。”

和沈婉仪一样,大部分学员对军号、军号史知之甚少。为了让学员对军号有更多地了解,培训班开设了军乐与司号史的课程。学习历史后,沈婉仪知道了1927年红军连的编制中就已经有了司号员的编制;了解到在朝鲜战场上,我军司号员郑起创造了一把军号吓退联军一个营的传奇故事。

火箭军某基地下士刘奇的爷爷就曾是一名司号兵,上过战场,吹过军号。4月的一个夜

晚,年近耄耋之年的老人听说孙子要来北京学吹军号,一高兴,喝了半斤白酒。

“第一周吹响、第二周吹长、第三周吹变音……”为期两个月的培训生活,时间被精确切分、标记。培训初期,听不懂的乐理、唱不会的乐谱,让战略支援部队某部中士邓伟觉得度日如年;等到了第二个月练习21个号谱时,他又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完全不够用。在这栋小白楼里,“时间相对论”一直存在着。

作为解放军军乐团首席小号手,刘保国老师认为,学员要想将气息掌控自如,将21个号谱吹奏得游刃有余,两个月时间远远不够。“‘树大自植’,院校培养只是第一步,后续的自我练习更重要。”

眼下,处于“生长季”的学员正在不断地给自己做“加减法”,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。学习时间已经过半,刘奇还没正经出去游玩过,在他看来,周末是“弯道超车”的好机会。

记者简单估算了下,平均一天下来,学员和军号“亲密接触”的时间将近8个小时,除了吃饭,通常一练就是大半天。高强度的练习,嘴唇酸疼是常有的事。休息时,有人选择“沉默是金”,有人“打嘟”放松,刘奇喜欢含着一颗糖闭目养神,嘴尖的压力迅速被舌苔上的甜所掩盖。

向“领头羊”进阶

“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前,学院开设4期培训班,按照每班40-50人的培养计划,想要满足全军司号员的需求还有很大缺口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培养的学员不仅是司号员,还是教练员。他们将成为‘种子’,回到各军兵种部队组织司号教学。”梁召今说。这就意味着,在两个月的时间内,学员不仅要学会吹,还得学会教学组训。

4月30日,第一期学员全部顺利毕业。年轻的学员回到部队,一边继续吹奏练习,一边当起了各自单位司号员培训班的“领头羊”。

5月9日,侯猛飞在部队驻地山西太原开设司号员培训班,成为同期第一个独立开班的学员。从学员变身教员,侯猛飞这回面对的是80名学员,培训时间为40天。电话采访中,侯猛飞直呼“压力山大”,熬夜备教案成了常态。5月27日,韩军杰的司号班也开班了。开课不到半月,韩军杰接连感叹“难!头疼得很。”眼下,他们遇到的教学难题和几个月前教员们遇到的棘手问题是相似的。对于这一点,教员们早有准备。

五一假期第一天,刘保国编辑了一条近千字的授课心得发到学员群里,帮助学员尽早适应教员角色。而更多的任前培训早在开班时,就有了安排。

授课过程中,教员注重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学员掌握一定的教学技能。班主任杨磊负责乐理课教学,在他的课堂上,他会预留半节课时间让学员走上讲台授课。“学员在试讲过程中,一面巩固课堂知识,一面掌握授课技巧。”事实证明,杨磊的尝试很奏效。

武警内蒙古总队下士郭胜强曾是一名长号手。课堂上,郭胜强的积极性很高,喜欢举手上台,不论是答题还是试讲。在同学眼中,他是一个胆大的汉子。“其实我也很紧张,但我得提前适应讲台上的气氛,回到单位后得组织司号员集训。”

第一期培训结束,学院选拔了5名优秀学员留校,担任第二期培训班的小教员,辅助老师对后进学员进行吹奏指导。

启用学员担任助教,这在军事文化学院尚属首次,既锻炼学员的教学组训能力,又充实师资队伍。首期学员杨鹏和杜耿松位列其中。

“号嘴位置上下各占一半,号嘴的支点在唇下唇……”刘保国讲授吹奏要领时,杨鹏站在一边仔细观察记录。扎实的任前准备工作从他桌上摆放的两本厚厚笔记本可窥一斑。“老师教的、同学吹的、自己琢磨的,我都写进了本子里。”杨鹏说。闲暇时,他还将自己吹奏

的21个号谱录成音频,发到第二期学员的手机上,帮助大家听音练耳。武警某部战士杜耿松买了一台小型摄影机,将上课画面记录下来,课后再根据视频进行整理。“课堂上老师指出的问题、产生的原因、解决的方法,这些在我今后的课堂上都能用上。”

为了战斗,前进

“这是一种铜制的乐器,能发出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。在战场上,只要它一响起,共产党军队就像着了魔似的,全都不要命地扑向联军。每当这时,联军总被打得如潮水般溃败……”这是美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李奇微在《朝鲜战争回忆录》里对军号的描述。

原空政文工团乐队队长左刚,是30多年前的最后一批司号员,时隔多年,仍能清晰地吹奏出每一种号谱的音律,他深知吹响军号对于一场战争的意义。

一串号音就是一道命令,号音吹得是否正确关系到战役的成败,有时还能够达到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作战目的。

课堂上,左刚的要求格外严格。“宁可不吹,也不要吹错。”他时常重复着这句话。在他看来,学员们吹的还是当年的号音,为的还是同一个目的:“战斗”。

“531 555 531 555……”这是韩军杰最喜欢吹的冲锋号。一段9秒的冲锋号,他反反复复能练上几十遍。“冲锋号一响,我军将士勇气倍增,杀声震天;而敌人听到了,便会胆战心惊,溃不成军。”

军号重新“征召入伍”,在徐惠冬看来,是精神的传承,更是向战争的宣誓,它将唤醒蛰伏在军人骨子里的血性,“军号承载着传承红色基因、强化号令意识、推进正规化建设、提振军心士气的的作用。特别是在未来组织的战备演练中,电子播放号将被取消,改为司号员吹奏。一旦我方受到无线电干扰和电磁压制,军号仍然能够作为保底通信手段。”

刘伯承元帅曾说,没有通信联络就谈不上军队指挥。可以说,号令就是指挥员在战斗中的喉舌。在战场上,司号员同指挥员一样,都是敌人重点狙击的目标,时刻处于运动中的司号员需及时躲避来自敌方的危险。正因如此,在司号员培训计划的制订过程中,“立足实战,聚焦备战打仗”成为课题组规划教学设计时的重要考量之一。

“培训第七周,学院将安排模拟实战环境的教学课程,学员将被送到陌生演训场,在近似实战的战斗环境中组织训练,以提升他们在战斗中克服不利天气、地形的影响,快速行进、寻找掩体、在安全地点发送号音的能力。”徐惠冬向记者介绍。

为了在战场上吹出完美的号音,学员们就像是一块晒了很久的海绵,拼了命地吸收知识,加快学习进度,谁都不想放松,谁也不敢放松。

行文即将结束时,韩军杰给记者发来一条消息,“军号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语言。一想到8月1日,部队的作息号将从我和战友们的号角里吹出,响彻祖国的一座军营,我就会由衷地生出一种自豪感,好似回到18岁参军时的模样……”

摄影:张增亮
制图:扈硕

历史链接

1927年,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中编有司号分队和司号兵。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后,为保障各级首长调度和指挥部队,在军部副官处编司号班,设司号官,在团、营、连分设司号长、号目和司号员。

1931年11月,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在瑞金召开红军司号会议,制定颁布了《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》,并发出《关于司号员问题的通令》,人民军队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号谱和司号制度规定。

1933年3月,中央在瑞金附近坪山岗设立红军通信学校,开设号兵班次,开始系统培训司号骨干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全军部队在连编设司号员,营编设司号班,团编设司号排,司号员成为我军基层部队传统的“八大员”之一。

趣闻轶事

由于谱系复杂,一个司号员的养成很不容易,红军时期国共双方的军队都有“交号不交号嘴”的规矩,即司号员调动、离队,要把军号交上去,而号嘴属于个人物品,不必交。所以,号嘴就成了司号员的职业标志,每次打完仗,双方都很重视在俘虏身上搜查号嘴,一旦发现俘虏中有司号员,是要千方百计留下来的。

革命年代,司号员在军中享有较高的待遇。除日常和指挥员一样的生活待遇外,红军中的司号员每月有三块大洋的鸡蛋费,即便在艰苦的长征途中,也有一块大洋。

在我军司号员队伍里,走出不少开国将军。据不完全统计,光是当过司号员的开国中将就有张国华、聂凤智、王辉球、邱创成、李成芳、蔡顺礼、刘西元等。

